

目 录

- 1、我的回忆……………祝义亭 (1)
- 2、给刘伯承司令员当警卫员……………王朝华 (6)
- 3、张琴秋脱险记……………杨绍德 (9)
- 4、巧渡巴河……………龙有德 (16)
- 5、夜摸铁厓山……………任其利 (18)
- 6、在草地，我看到了亲人……………苟秀英 (22)
- 回忆长征几个生活片断
- 7、红军攻占瓦室铺……………蒋永仁 (30)
- 8、鹦哥嘴战斗……………屈卓文等 (32)
- 9、记杀牛坪两次战斗……………张定元等 (37)
- 10、石婆山战斗……………张发辉 (42)
- 11、竹峪关战斗……………苟在发等 (45)
- 12、空山坝大捷……………李瑞明 (50)
- 13、罗亭寨战斗……………李文质等 (73)
- 14、中岭嘴战斗……………石大明等 (78)
- 15、牛王庙拼刺刀……………巨家容等 (81)
- 16、南垭土地焦煤厂……………景全秀等 (85)
- 17、泥溪铔厂……………吕汉武等 (87)
- 18、苦草坝铁工厂……………李宗群 (90)
- 19、钢溪河脚码子厂……………景尚秀 (92)

- 20、毛浴镇钢铁加工厂.....马洪科 (95)
- 21、流二沟绑腿厂.....李能雨 (97)
- 22、新场坝糖厂.....何国忠 (99)
- 23、工农总医院.....李瑞明 曾毓文(102)
- 24、永安坝红军医院.....刘进先等(134)
- 25、罗盘田的故事.....张国苔(139)
- 26、符阳废县考查.....杨 林等(140)
- 27、龙池寨下侍郎坟.....杨金儒(142)
- 28、大良城书馆今昔.....李瑞明(145)
- 29、李善济趣联.....朱北辰(151)
- 30、红军路上随访记.....肖功厚(153)

我的回忆

祝 义 事

在参加红军前我是个工人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营山县城的万寿宫对面，父亲是个邮差，从营山调通江县城走通江至江口场(今平昌县)的邮路。我跟随父亲到了通江县城定居，当时邮局在钟鼓楼下面一个坡坡上，我们住在邮局向钟鼓楼走的方向离邮局只有三间铺面。我学过铜匠没有出师，又去学泥水工，在当时，我的泥水工技术还算不错，是出了师的。邓锡侯在他的老家营山县城修图书馆，门前的几个大字就是我用稀泥巴做成的；巴中县建修的那座“回风亭”就有我在当砖工。到了通江后，我有时给别人做泥水工活，有时替父亲走邮差，走通江至江口场的邮路。

我初次是当选为通江市内务委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天气有点冷，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到了通江县城，红军一来就首先占领邮政局，红军刚驻进邮政局我就报名参加了红

军。我随红军一起在县城里开展工作，没过几天通江县城里建立了通江市苏维埃政权，文炳林同志当选为通江市苏维埃主席，选我为通江市苏维埃内务委员；还有几个委员的名字我就记不起了。不久，我由通江市调赤江县委任收发员，赤江县委设在毛浴镇。又不久，省委书记袁克福要我同他到新场坝一带去检查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巴中召开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我同袁克福由新场坝转来到巴中去参加代表大会，大会上熊国炳同志当选为省苏维埃主席，余洪远同志和我当选为省的付主席，我还兼任了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省邮政局长。省苏维埃的秘书名叫黄超。我同张国焘、陈昌浩、倪志亮等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多些，很多工作是间接管理；我们省里的几个负责的最担心的就是粮食，因为当时要打仗，要建立政权，离了粮食是不行的，省里几个领导人下去工作都要催收粮食和检查粮食。一次我从万源检查粮食回来时，毛浴镇已开始砍断浮桥，我也就随军走了，连余洪远是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中途川陕省苏维埃改选掉了一些不称职的委员，我没有被改选掉过，一直是省的副主席、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省邮政局长。长征中大家都编入了队伍，原来的各级地方组织就自行消失了，我的副主席职务也去掉了。

通 信 工 作 很 重 要

川陕苏区的通信工作是搞得很好的，因为通信工作很重要。红军打仗离不了通信，做什么事都离不了通信，每打开

一个地方首先就要抓通信建设。省、县、区、乡都有邮政机构，省里的信只送到县上，县负责区乡。通信机构的名称不统一，有的地方叫邮政局，有的地方叫交通队，有的地方叫交通局，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都是送信的。邮局的邮票由上级财政部门印发，售完后将款上缴财政部门，邮局本身无权印制邮票。邮局不管电话，也不管运输。军队和地方都没有自己的通信机构，军队的通信由军队自行管理。邮局的公章、日戳都是木制的；衣服不统一，有什么就穿什么；通信人员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后来财政情况逐步好转，每人每月才发给了五角钱的烟草费。

交 通 运 输 任 务

当时的交通主要就是送信，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没有专门管理道路的机构，有些小路不好走就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把该挖宽的地方挖一下，该铲的铲一下，该砍刺草的地方砍一下；遇到要搭浮桥的地方，由地方发动群众去搭，军队派人指挥。

当时的运输任务主要是地方向前线运送粮食，打仗时组织担架队，这些都是由地方政府抽派劳力编成连、排，选出临时负责人，运送到指定的地点。

张国焘不相信知识分子

张国焘对知识分子有怀疑，在内部搞肃反有三顶帽子，

一顶是“好吃委员会”，一顶是“第三党”，一顶是“ABC”，这三顶帽子拿任何一顶都可以整人，那时有的同志头一天都在工作还是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坏人，抓起来就不见了。抓罗世文和廖承志两个同志我是亲眼看见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巴中刚开完会在招待所睡下。天气有点冷，大约晚上两三点钟外面在乒乒乓乓的打门，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送通知的，起来开了门，门外就进来了几支枪。罗世文和廖承志两个同志衣服都没穿就抓起来押走了。省邮局有三个同志，工作也很好，其中有两人是亲兄妹，他们是从白区跑到红军里来的。张国焘说从白区来的不放心要审查，派人把这三个人抓去不知怎么处理的，后来也不见人了。红军到了通江的时候，国民党的邮政局长没有跑，张国焘马上派人抓起来，可能是杀了！你想张国焘连内部同志都整，还能放掉国民党的局长吗？他搞的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西北联邦政府又叫格勒政府

红军到了少数民族地方的大金川，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毛主席要北上，他要南下，发电报把徐帅通知转来，在少数民族地方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因为少数民族地方叫“格勒”，所以西北联邦政府又叫“格勒政府。”邵式平任西北联邦政府主席，我任西北联邦政府的内务委员。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造成我们三次经过草地 吃了不少苦头。

红军长征后我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九三二年我参加了红军，我的父亲祝兴和也在红军的邮局工作，我们长征时父亲在通江城没有走，国民党政府回来后把我的父亲杀于通江城内，我爱人蒋东儿和年满一岁多的男孩子住在老家营山县城也被国民党杀害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已是五十多年了，这样长的时间很多事都忘记了，就是当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很多同志也记不起名字了。

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采访了红军时期的原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省邮政局长祝义亭同志，他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还能记得起的川陕苏区的邮政情况和其他一些事。对通江很关心，在摆谈中，也问钟鼓楼、壁山坡、毛浴镇、得汉城的现时概况。根据祝老的介绍，从文字上略加整理，以供参阅。本文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由我负责。

谢 孝 元 整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给刘伯承司令员当警卫员

王 朝 华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我给刘伯承当警卫员。开头他是红军大学校长。红十一军与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东南的镇原县，听说张国焘带领的西路军在甘肃高台打了败仗，党中央命令刘伯承组织援西军，驻于镇原县等候消息，才便于行动。在暂时休整中，刘伯承就训练部队。

关心战士生活。经常深入战士食堂，亲自尝菜是否有油？常问规定供应的油是否用完？如果查出扣了战士的油，或有贪污，就立即处理，决不循情。甘肃大米少，多吃馒头。缺米煮稀饭，就烧一锅开水，盛在瓦缸里，放一些茶叶。一次刘伯承到厨房看见茶缸内有沉澱，就叫炊事员洗茶缸。他说：“茶水不清洁，吃了要生病。”从此，要求炊事员每天洗茶缸一次。

鼓励战士批评自己的缺点。有时在午休期间，故意歪戴帽子、斜穿衣，从司令部往外走。过哨口，如果战士敬礼后，要他戴正帽子，穿好衣服，就连连称赞，说：“好同志，好同志，敢于坚持原则，批评我的错误。懂吗，这就叫官兵一致。当官的有批评教育战士的责任。有了错误，战士

也应该批评。不这样，就不叫官兵一致了。”如果以为他是司令员，不问不理，让其过去。走不多远就会回来，追问站岗战士是哪排哪班的？为啥不对歪戴帽子，斜穿衣的行为提出批评？他说：“在执行军纪上，没有上级与下级之分。不管谁，只要犯了就得批评，不能坐视不理。我是司令员就批评不得吗？犯了错误，还应批评严一些。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若不带头执行军纪，怎么能教育战士？”

鼓励战士坚持锻炼。刘伯承司令员喜欢打篮球，经常教育战士要坚持锻炼。但也因人而异，不强求一律。我在川陕苏区，右腿两次受伤，不能参加打篮球的剧烈活动，就教我练习单杠。做不来单杠上的基本动作，就亲手教。先教容易做的双脚齐上，后教比较困难的单挂单脚上，再教更难的双挂双脚齐上。教了前三个基本动作，再教难度大的动作。刘司令员先做示范动作，再慢慢教。态度温和，开头做不来，他也不发脾气。总是说：“一次不行，二次。多练几次就行了。只要刻苦练习，没有学不会的。”刘司令员教我单杠上的动作，接连好几天，直到学会才离开。

从实际出发，不图虚名。警卫连的战士练习劈刀，动作十分熟练。刘司令员认为战士们能自觉练习是不错的。一天就亲自到操场上看警卫连的战士练习劈刀。开头眉开眼笑，心里高兴。看了一会儿眉头就皱起来了。原来警卫连的战士练习劈刀，用的木刀。他说：“要练就真刀真枪，那个木板子能消灭日本鬼子吗？”回去后，立即叫供给部的同志给警卫连的战士每人发一把钢刀。

真刀练习，开头出了不少问题：不是劈了耳朵，就是划了脸。有些同志泄气了，说：“还是木刀好，少出毛病。”

请求仍用木刀，刘司令员说：“出点乱子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出点乱子，以后在战场上就不出或少出乱子了，怕啥嘛！”他就亲自教战士劈刀。首先教劈刀要领：“刀要握紧，刀口要朝外，刀要挨身；刀、手、眼三者要紧密配合。刀走那，眼看那，动作要协调。”经过刘司令员的亲手教，劈刀技术提高了，增强了杀敌本领，在和敌人拼刺刀时显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十一军编为126师，刘伯承任师长辖385旅、386旅，不久，我调385旅770团当兵，长期跟刘司令南征北战。今年十一月，惊闻刘伯承与世长辞，不胜哀痛，回忆给他当警卫员的历史，以寄托哀思。刘伯承严于律己，关心战士生活的作风，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会加快我们的四化建设速度。刘伯承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李 瑞 明 整理

ERTONGBOOK.NET

张琴秋脱险记

杨绍德

编者按：张琴秋参加西路军失败被俘，改名换姓潜伏下来，在青海西宁新剧团当炊事员。通江妇女杨绍德设法营救，使她摆脱险境。

杨绍德系通江县马家坪(现火炬乡)人。1932年冬，红军入川，参加十二师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任小队长。1933年3月，到得汉城女工连(后改营)工作，因患麻疹到竹子坎(泥溪乡场后)总医院就医，留总医院工作。张琴秋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杨绍德在她的教导下，进步快。1934年春，总医院由鹦哥嘴迁沙溪王坪，杨被提为该医院伤病九连连长。1935年1月，红军向西转移，张琴秋任妇女独立团团长，杨绍德调该团，先任排长，后任某连指导员。在长期的共事中，杨绍德认识到张琴秋是中国妇女杰出的领导人，对人和蔼，关心同志，立场坚定，忠于党的事业；在工作中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西路军失败，杨绍德身受重伤，被俘后，被迫与国民党一军官结婚。下面是她回忆营救张琴秋的情况：

我被俘时，任妇女独立团一个连的指导员，任新桂是党

支部书记，党石英是支部干事，同时被俘的有二十多人。敌人将我们押送张掖县，关在衙门后一个屋内。任新桂、党石英和我都受重伤。伤兵说：“受了伤，不看就不觉得痛，一看手脚就烂了，痛得难受。”我受伤，一直未看，也未摸过。马步方部，军纪很坏。被俘那天，把我们关在一间黑屋内，半夜有兵来敲门，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我们就大喊大叫：“有贼啊，快来人呀！”敌旅长韩其功住在不远的地方。听到喊声，派人锁了门，才安全度过了这一夜。受伤当俘虏，敌人是决不会认真治伤的。尽管口上说得好听，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任新桂受不了折磨自杀了，党石英的伤在脚上，不知敌人用了什么药，全部溃烂也牺牲了。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当俘虏，平时体会不到，当了俘虏就体会到了。

那些回子兵，一个个气势汹汹，神气十足，傲慢骄横，粗鲁野蛮。一见我们，就走拢来，你摸一下，我摸一下，你说这一个漂亮给我，我说那一个可以给他。流氓动作，流氓语言，气爆肚皮。敢怒不敢言，打落牙齿和血吞，只有咬牙忍受。

在张掖住了两月，就押送青海西宁。一行二百七十三人，走了十多天，到西宁活埋了二百六十六人，留了陈兰英、张明义、曾秀英、石行阳、郑光明和我。六人中，又有两人不知去向，可能被杀。跑了一人，这个同志很勇敢，不知怎么跑出去的。留下我们三人，不晓得那一天死。关闷了的鸡，懵懵懂懂过日子。

一天，有人说，李处长要见我们。第二天，李处长来了，叫李孝忠，是国民党派到马步方部的官员。见面时，先

把自己吹嘘了一番，说我们六人，是他叫留下的，要不，二百七十三人全杀了。他说：“我不是马步方，杀你们，而是救你们的。”听了这些话，认为是个好人，内心还是感动的。

李孝忠接见后的晚上，我们就住在他不远的地方，送来衣服，长的长，短的短，大的大，小的小，穿在身上怪难看。我们女工营的，是制衣服的能手，长的改短，短的加长，大的改小，小的增大，穿在身上就合体了。大约住了三月多，一天，李孝忠找我谈话，说：“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嘛，给你找个人户好吗？”脚肚子拗不过大胯，在那种情况下，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只得说：“你咱说，我咱依。”不久，我就与国民党青海省党部陆成结婚，我二十四岁，他四十八岁，年龄恰恰大一倍。

与陆成一起到青海的，有袁春和（青海省党部民政科长）、陈焕章（青海省无线电台台长）、郭世生（青海省报社社长）、谢士斋（青海省医院院长）等六人。他们打得火热，你有事帮我，我有事帮你，关系密切，亲如手足。与陆成结婚后，他们五人常到家里玩。陆成有两个儿子，大的二十四岁，小的二十二岁，都在南京读书。我与他大儿同岁。

西路军新剧团的人当俘虏后，仍在演剧。新剧团杨万才与女演员赵全珍结婚。一天，我到杨万才家里玩，突然看到了张琴秋，心里不禁一惊，她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怎么到了这里？看到她，使我想起了很多往事：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妇女独立团，她都是领导人，说话和蔼，对下级关心。长征路上，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女同志，不管任务

好艰巨，行程好困难，总是豪情满怀，兴致勃勃的。有了她的领导，我们女同志很少掉队，牺牲的也少。我所晓得的，整个长征路上，只有十个女同志牺牲：一是1935年4月，过一道河，水暴涨，河面牵铁丝，妇女拉着铁丝过河，三个女同志掉到水里淹死了；二是1936年3月，在一个叫十八道水的地方，敌人的飞机来了，三个女同志炸断了脚杆，抢救不及，被敌人杀害；三是妇女独立团一连的三个女同志饥饿到极点偷二连的干粮，察出被杀。张琴秋对这些牺牲的同志十分痛惜，经常提起他们。三个过河牺牲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当她们被水冲走时，张琴秋就命令五个警卫战士去抢救。事情偏偏这样凑巧，警卫战士快要赶到时，一个抱住石头的，因时间过久，手一软，就被水卷走了；两个抓住树枝的，枝桠断了，掉入了漩涡。张琴秋看到这种情况，气得捶胸蹬足，她说：“多么可惜啊！这些同志，在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最积极，吃苦最多，对革命贡献最大。离开川陕苏区，风里来，雨里去，忘记了劳累，忘记了一切，吃了那样大的苦，没有享受到革命一点幸福，叫人怎样丢下她们呢？”张琴秋对自己要求严格。同志牺牲了，总是责怪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如十八道河三位女同志受重伤，因抢救不及而牺牲，她不止一次地责怪自己，说只怪我这个独立团长没有组织好担架队，致使三个重伤女同志落到了敌人手里，从此更加重视担架队的工作。四个犯错误而被杀的同志，口上没有说什么，内心也很同情。她常说民以食为天，不吃东西怎么能与敌人拼刺刀？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想方设法安排战士的生活。象她这样的人都当了俘虏，我的心里不禁一阵阵绞痛。害怕敌人发觉，又不免有些紧张。看来她的心理也难

过，也紧张。我悄悄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来了二十多天了。”说了不多几句，外面来了人，我们就装着互不相识。来人走后，我又问：“你来这里，有人认识吗？”她说：“有人晓得我到了这里，但认不得。”又问：“改名字没有？”她说：“改了，叫苟秀英。”她衣著褴褛，一个光头，上身穿一件乌不乌，黑不黑的衣服，油腻重重，好象半年不曾洗过；下身穿一件补丁加补丁的旧裤子，短得几乎盖不了连二杆；脚上一双青布鞋浸满油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象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太婆。1933年春，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瓦室铺，那时才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胖登登的，头戴八角帽，身穿青布军装，脚穿布板草鞋，打着绑腿，飒爽英姿，极其威武，与现在比，简直成了两个人。

自从这天以后，心里象压着一块石头，老是闷闷不乐。象她这样的人当了俘虏，其他领导人的情况就可以想象了。西路军失败得多惨，张国焘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想起川陕苏区那种打土豪分田地，闹得天翻地覆的情景，心里怪不是滋味。我与陆成结婚不久，对我还好。陆成与李孝忠、袁春和、陈焕章、郭世生、谢士斋等关系密切。能不能通过我与陆成的关系，作通五人的工作，把张琴秋救出来。天天想着这件事，想对陆成说，又怕闯出祸来。但我还是想试探陆成。一次，谈起在红军里的事，我说：“红军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啊！”陆成虽然脸一下黑了起来，但没有指责。过了好几天，我又说：“在红军中我还有不少要得很好的女朋友啊！”陆成似乎对我同情，说：“那是以前的事，不要惦记吧！”一次，陆成从外面回来，心里

高兴，乐呵呵地说：“有肉吧，包饺子吃。”我说：“啥事这样高兴？”他没有说，后来打听到，从报上看到国共合作的消息。国内这一重大变化对我营救张琴秋有利。有一个晚上，闲暇无事，东西南北地摆龙门阵，我就说：“有件事想给你谈，又怕不行。”听到这话，陆成就巴心巴肠地问：

“啥们事，你说嘛，不说又咱个晓得啊！”我说：“有一个女老婆是我的好朋友，在红军里当过官，我想营救她，怕你不同意。”陆成说：“既是你的好朋友，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了，只要能办到，一定想法。”我说：“你是专门整那些人的，说出来，不会高兴的。”他说：“过去跟现在不同了，过去要整的，现在也不一定。”我说：“不信，共产党与国民党为冤家对头人，不整能行吗？”他说：“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仇怨也可以和解嘛。”我说：“一旦说出来，你变卦，那就完了。”他说：“决不整。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发誓给你当儿子。”见他思想有所改变，我才说：“就是新剧团的苟秀英，在通南巴比我的职务高，是个好人，想营救，不知行不行？”陆成说：“行，去找李孝忠商量。”陆成将此事告诉李孝忠。第二天，李孝忠到家，叫去喊苟秀英。

苟秀英到我家，李孝忠问：“你在那边做啥？”她说：“在医院负责，医治伤病员。”李孝忠说：“你叫什么名字？”苟秀英一下变得严肃起来，说：“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到这里来了几十天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怕杀头。我叫张琴秋。说出名字后，随你们的便，要杀就杀，要关就关。”李孝忠打了一个哈哈说：“现在不是过去了。大敌当前，岂能同室操戈，一定想法营救，放心吧。”

李孝忠要张琴秋写个履历表。张琴秋写一手好毛笔字。字写得象麦粟那么大，整齐隽秀。张把填写的一张履历表交给了李孝忠。

李孝忠与陆成商量，在不远的后街找了一间房子，让张琴秋住下。白天，在我家玩耍，晚上回去住宿。对俘虏人员的处理，要马步方说了作数。我想以请工人的名义，把张琴秋安置在我家。托李孝忠向马步方说。马步方不同意，说：

“那个老婆子又脏又臭，怪难看，煮个啥饭啊！”这一计划落空，又想别的办法。李孝忠与陆成商量，要张琴秋装病，以到医院治病为名，离开新剧团。青海妇女普遍患花柳病，就叫张琴秋装患花柳病，睡在床上七八天不起来。李与陆成到青海省医院暗中与谢士斋商量，开了个入院就医证明。从此，张琴秋名义上在省医院就医，实际上寄留我家。

陆成是浙江人，张琴秋也是浙江人，我是四川通江人，李孝忠是四川隆昌人。我们都认了老乡。通过我与陆的关系，又利用家乡人的关系，几经奔走，使马步方放弃了对苟秀英的控制。大约1937年7月下旬，李孝忠到南京开会，将张琴秋从青海西宁送到西安。

走的那天，我与吴忠连陪送。张琴秋装病用被盖包着，睡在小车里面，我与吴忠连坐在车门口，安全地送出了西宁市。李孝忠从南京开会回来，说到西安与张琴秋同住一家旅馆，被宪兵察出，送张到感化院后转南京，就给周恩来同志写信，说了此事。周恩来同志与南京政府接洽，营救张琴秋回延安。不知这些话是否可靠。不过张琴秋从西宁到西安所经历程是我所晓得的。

李 瑞 明 整理